

· 社会史研究 ·

日常生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对一种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

常利兵

(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正像其他人文科学的内在结构一样, 历史学的研究与发展也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之分, 而且彼此间相互制约与补充, 最终将史学的总体研究推向前进。响应时代的深切呼唤, 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又会相对地凸显出某一支来进而成为解读现实社会和历史事实的重要阵地, 这也是所有科学发展本身含有的学术价值及对社会变迁的理性关怀。文章从日常生活这一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实践息息相关的社会事实着手来探讨社会史的深层研究, 以期真正体现出探微知著的功能, 不断地将历史学的发展引向深入。

关键词: 日常生活; 社会史; 理论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 K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5935(2009) 02- 0067- 05

一 何谓日常生活?

尽管日常生活中丰富多样的内容已随着传统史学侧重“上层精英”和重大事件研究维度的淡化、新史学关注“自下而上”和普通民众历史事实的日渐兴盛而成为社会史、文化史、城市史等研究热点, 但是有关日常生活这一概念的系统界定还值得探讨。雷颐先生在《日常生活与历史研究》一文中指出, 所谓“日常生活”就是以“常识”为基础, 不过“常识”因太平常、普通而常为各路英豪所不屑, 所以他们往往不顾常识地要压制甚至消灭(如有可能) “日常生活”。^[1] 雷颐的观点意在强调就一些日常生活里的具体琐事和历史碎片来分析过往的历史。笔者认为日常生活尽管始终存在于一个人的生活实践当中, 但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它本身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所显现出的具体生活内容。

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 历史学研究内容日趋多元化, 曾被“政治统帅一切”的教条束缚的史学研究已在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和范式建构等方面有了巨大转变和新的视野。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可谓独领风骚, 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了由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彻底转变。但对日常生活研究范式的建构和阐释还多有欠缺。可以说, 愈是众所周

知的事实愈难以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抽象概括。已故的著名社会史学家乔志强先生在其构建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理论体系中将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围归结为五个方面: “1 社会结构的研究; 2 社会生活的研究, 社会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又包括精神生活, 它更多地体现社会各阶层的面貌, 了解群众的实际生活, 因而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3 社会功能; 4 社会区域研究; 5. 社会心理研究。”^[2] 乔先生将社会生活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无疑为历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但对社会生活是否就是日常生活及两者的相互关系如何则少有涉及。也许抛开对日常生活概念的界定, 只注重具体历史事实并不影响社会史研究的深入, 但是史学理论的整体创建必须建立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领域各自对研究内容进行概括和抽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而以具体的经验事实为基础进行范式的建构则是理论创建的必要步骤。因此, 仍有必要对日常生活概念本身进行切实的界定。

那么, 何谓日常生活呢? 匈牙利女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A·HELLER)在《日常生活》一书中从多方面分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和一般图式的特点。她认为: 首先, 日常生活具有重复性, 是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础的活动领域; 其次, 日常

收稿日期: 2008- 11- 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06JA770026)

作者简介: 常利兵(1976-), 男, 山西泽州人,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生, 主要研究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

生活具有自在性,是以给定的规则和归类模式而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地展开的活动领域;第三,日常生活具有经验性和实用性。赫勒说:“如果个体要再生产出社会,他们就必须再生产出作为个体的自身。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3]这就是说,所谓日常生活就是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这各种活动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层次:一是日常消费活动。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以个体的肉体生命延续为宗旨的日常生活资料的获得与消费活动,是日常生活世界的最基本的层面。二是日常交往活动。杂谈、闲聊、礼尚往来、情感交流、游戏等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日常生活交往活动,占据着日常生活的重要地位,并随着物质财富匮乏问题的相对缓解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愈益丰富,它构成了人的日常社会活动。三是日常观念活动。这是一种非创造性的、以重复性为本质特征的自在思维活动。它包括传统、习惯、风俗、经验常识等自在的日常思维。^[4]可见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过程中所外显的具体实践活动并非一回事,它与社会生活也不是等同的,在概念界定上有属种之分。社会史研究普通民众的多样生活,透析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的结构与功能,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三个基本层面的具体内容实践而已。赫勒也许只是从较为抽象的角度阐述了对日常生活的解析,但她给予“日常生活与历史研究”的具体开展则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学理启迪,就像不能漠视普通民众的生活一样,对日常生活的解读和建构同样不能置之不理。

通过前面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理论回顾以及赫勒的论述,我们给日常生活作出如下界定:日常生活是以常识为基础,以重复性、自在性和经验性为特征,处于特定的历史时空条件之下的人们(既有上层精英人物,也包括下层普通百姓在内)所进行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风俗礼仪、岁时节日、行为心理等具体生产和生活实践的抽象集合体。这些活动的主体——人,既可以是帝王将相,也可以是农民、手工业者、平民、商人及小知识分子等。在此,笔者并不苟同那些仅将日常生活的研究内容锁定在“下层民众”身上的做法,原因之一就是“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并非要彻底地替代“自上而下”的传统路数,而只是将两者置于一个较为合理的、平衡的分析框架中来“解构”历史,否则就是摆脱了一个极端又不自觉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其次对于“上层精英”人物

而言,他们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由此入手,其实质便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巧妙联接,通过对他们日常生活的“自下而上”的分析也许更能全面地反映出“自上而下”的历史演变。

二 日常生活研究的缘起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开始转型,日常生活渐渐以独立的姿态呈现出来,具有自身的运作逻辑。过去是依靠制度的力量,将日常生活置于社会大目标的控制之下,即强行将日常的每一时间、每一行动与社会总体目标联系在一起。当人们发现这种对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非但没有使他们接近那个伟大目标,反而离它越来越远时,自然抛弃了这种组织方式。于是,失去控制的日常生活就凸显出来。当今的日常生活已成为人们无法漠视的存在,历史学者也纷纷将研究视野转向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认为,历史前提不是先验地构造出来的,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加以确认。“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5]“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5] 178}这样,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终结了一切旧的自诩有独立思想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阐明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6] 623}历史发展的真实动力,仅仅依靠从政治、形而上学或宗教中无法找到,而是从它们自身中去寻找。历史研究如若轻视或蔑视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就无法正确理解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第一次把现实的生活即日常生活纳入历史研究领域。这样,历史研究不仅要研究理论、思想等精神生产活动,而且更加重视提供这一宏大的世俗基础的物质生产活动。历史不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过着现实生活的人民群众的历史。每个日常生活的人都是历史剧的作者,又是历史剧中的人物。马克思的宏观论述给我们进行具体的历史研

究指明了方向。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 史学研究对象的多元化及其丰硕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宏大指向紧密相关, 而不再是对其庞大体系的肤浅理解和教条化。

改革开放 30 年, 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国家与社会的日渐分离并各自回归到自己应有的“阈值”中去。现代社会已发展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科技、艺术等方面密切交融与制约的多元化社会, 而作为日常生活的主体——人, 无论是精英人物还是下层百姓, 更多地要基于社会这一空间结构来透视其生活的世界, 从而“从下至上”地解读国家与社会、地方与中央、个体与组织等之间的互动关系, 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把人限制在政治范畴即国家之内, 而大大忽视了其首先是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的事实。因此国家与社会的重新定位, 完全是社会进步和发展使然, 尤其是对社会人的极力肯定与关注给史学研究的日常生活这一社会史角度带来了良好的契机。

此外, 谈到日常生活研究, 不能不提及法国年鉴学派对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深刻影响。年鉴学派是由吕西安·费弗尔 (Lucien Febver) 和马克·布洛克 (Marc Bloch) 于 1929 年创立的, 它得名于是年发刊的《经济与社会学年鉴》(简称《年鉴》)。年鉴学派本着集合力量、网罗人才, 向传统史学挑战、为新史学呐喊的宗旨, 遵循“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透过实例与具体研究”、“拥有自身所固有的精神与个性”的方针, 为世界史学发展开辟了一块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研究天地。费弗尔的《腓力二世世纪和弗朗什-孔泰: 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马丁·路德: 一个命运》《16 世纪的不信神问题》等, 布洛克的《国王与农奴》《封建社会》布罗代尔的《腓力第二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日常生活的结构》勒华·拉杜里的《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民》和《蒙塔尤: 1294-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等等, 这些脍炙人口的历史名著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上均给中国史学尤其是社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正如伊格尔斯 (Georg Iggers) 所言: “令人惊奇的是: 这些著作没有一部是有着一项中心的体制可以作为历史叙述的一条线索的, 让人们的行动在其中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的作用是受到忽视的, ……而布洛克却从人类学切入封建主义, 把它当作是一个各种人际关系的复合体。”^[7]⁶³ 他还指出: “凡是在 19 世纪的历史学中占

有关键地位的那些个人, 他们 (指年鉴学派等人) 是极少提到的, 纵使在他们的著作里终究被提到了的话, 例如在布洛克的《封建社会》一书中, 很罕见有国王, 而且其出现也仅只是在边缘上。……个别人物重新出现在拉杜里笔下的 14 世纪早期那个异端村落——蒙塔尤之中, 这是侵入到历史人类之中的一个焦点, 其中有长篇大论是描绘被嵌入一种悠久的民间文化之中的男人们和女人們的。”^[7]⁶³ 在年鉴学派的视野里, 人们的日常生活及隐藏在其背后的心态、动机等长时段的、结构性的东西, 才是解读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决定性要素。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治史理念无疑为中国历史研究路径的多元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时空条件之下所需求的理性关怀及相应的研究理念与范式转变。作为“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学科, 也只有适应时代和现实的要求方能求得自身的进步和完善。当前史学界, 社会史、区域社会史、文化史、家庭史等对日常生活内容的深切关注和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社会现状使然。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人的生活事实有了属于自我的社会性成分, 日常生活也真正成了自我改造和具体实践的对象, 这种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型无疑唤起了历史学界对以往民众生活内容的书写和解构。作为社会史视野中的日常生活, 不仅包括各类行为活动的主体在内, 而且也充分体现着社会本身所赋予人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片段, 比如生产活动、居住方式、言语服饰、价值心理和礼仪习俗等等。日常生活从根本上是与社会进程相一致的, 是社会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以广博的时空界限把社会的经济现实、政治事件、文化生产、科学技术革新等统摄进来, 社会的转型、变迁也就在包罗万象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着、体现着和进步着。所以“理解社会及其发展的规律, 了解国家、历史, 就要求理解、把握日常生活; 变革社会就要求变革日常生活。”^[8] 日常生活成为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研究的焦点就是因为它是“时代的产儿”。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 哲学思维深处的启迪, 社会现实的深切呼唤, 史学本身的内在要求, 已给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及其对现实的理性关怀提出了一项不可推卸的时代重任即对日常生活进行全面系统的解读和研究。

三 日常生活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现代社会纷繁复杂, 生活主体及其实践对象的

多元化,已使历史研究不能停留在一维视野中来审视历史,单一的记录、描述甚至重构过去的图景已满足不了学科的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需要。深挖过去人们社会行为背后的复杂动机、心态以及从以往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传统习惯,业已成为解读现实社会中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这种历史与现实的深层联系也促进了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多学科交叉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

无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宏观理论体系仍在总体方法论上指引着人们进行日常生活的社会史研究与实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其历史学理论的基本原理作出了精辟的概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构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 232}正如常建华教授所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主要表现在广义的宏观社会史方面,所建构的宏观社会历史的理论模式,是一种“骨架”的社会史,它还需要补充作为“血肉”的狭义社会生活、生活方式的内容,而这方面恰恰是中国理论界长期忽视的。^[10]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宏观方法框架仍值得中观、微观史研究实践的遵循,诸如总体史观点、等级结构的观点、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观点、动态和发展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等等,即在分析研究日常生活现象时,不仅要了解该事物的现状,还要考察它的来龙去脉或历史演变,并对它的发展态势作出预测。

除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宏观框架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和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实际上这已成了中国史学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内在要求。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民俗学、生态学、环境学等学科已与历史学研究密不可分。例如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田野调查已成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其实在传统史学所侧重的典籍文献记录法不能满足对“眼光向下”的生活的阐释时,田野调查便成了进行社会史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工具,尤其是被“正统”史学排斥在外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是如此。田野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参与观察法,就是要求研究者深入到被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生产过程之中,与他们建立起社会关系,进行行

为、情感上的交流,以获取丰富翔实的原始资料。文化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凭借参与观察的实证研究方法,创立了一整套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现象的理论体系——功能主义理论。马氏为功能的理论方法作了如下定义:“这种理论旨在通过人类学事实的功能,通过它们在完整的文化体系内部发挥作用,通过它们在这个体系内相互联系的方式,通过这个体系与自然环境联系的方式来对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人类学事实进行解释;这种理论旨在理解文化的特性,而不是对文化的进化过程或对过去的历史事件进行猜测的重构。”^[11]人类学家采用功能主义理论方法来关注人类社会现象的做法对于进行日常生活的社会史研究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日常生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事实体系,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存在与发展均与这一系统内其他要素息息相关。我们只有从部分与整体、结构与功能的角度着手,将某一社会现象置于其所处的“情境”中方可深入浅出地理解和书写历史。

另外,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一书可谓社会史研究的典范。作为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著名史学家的拉杜里,他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在《蒙塔尤》这一著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更关注历史上人们的观念、心态、欲望、习俗、风气等等,例如对家庭、宗教、爱、死和生活、性、政治、服装、色彩、财富、人际关系、休闲生活等等的观念和态度。总之,就像人类学注重研究文化、特别是文化的差异或者说文化的个性和独特性一样,历史人类学也把视角首先指向历史上人们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生活状况、社会心理、观念需求、风俗习惯、内心欲望等等。这是历史人类学方法的特长,它有助于今天的人们具体了解生活在过去的先辈,因为它可以把历史表现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12]拉杜里把13世纪末14世纪初法国南部一个小山庄的村民日常生活很巧妙地与当时整个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活动联系起来,这无疑体现了一种结构功能理论的分析框架。面对同样的富妮艾宗教审判记录史料,勒氏的《蒙塔尤》的影响却最大、最为成功,这与他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直接相关。还有文化人类学的经典名著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也值得提及。马氏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当然,可接受的民族志工作的首要条件就是,它必须把该社区中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所有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因为这些方面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不把所有方面考虑进来就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一个方面。读者将会清楚地

看到, 尽管本书的主题是经济即“库拉”“交换贸易制度, 但却不得不经常涉及社会机制、巫术力量; 涉及神话与传说。实际上, 如同涉及主要方面一样, 它将涉及所有其他方面。”“库拉”是《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研究的经济现象, 但对于生活在库拉范围内的那些土著人而言, 该体制则对他们每一个成员的日常生活具有无上的权威。他们的思想、志向、欲望与虚荣无不与之密切相关。我们可以感受到勒氏与马氏研究社会现象所运用理论方法的相似之处, 甚至将其称为研究日常生活的最佳路径也不为过, 因为它们确实让我们看清了生活的本来面貌及在其中所不断发生的生产、生活实践全过程, 而且这一过程折射出个体与家庭、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家庭与社会、社区与组织等之间的真正内容, 从而为改进和提高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水平提供更为丰富、更为切实的学术关怀。

总而言之, 走进日常生活, 对其进行系统翔实的解读、分析和把握, 是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特征, 而且这种微观的具体的研究实践将有助于理解和掌握那些宏观史学理论的构架与现有的理论问题, 进而促使我们在更加科学、合理的层面上来思考和构建出具有时代气息的史学理论。

参考文献:

- [1] 雷 颐. 日常生活与历史研究 [J]. 史学理论研究, 2000 (3): 123
- [2] 乔志强. 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深化中国社会史研究 [J]. 历史研究, 1993(2): 8
- [3] 阿格妮丝·赫勒. 日常生活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 [4] 杨建华. 日常生活: 中国村落的一个新视角 [J]. 浙江学刊, 2002(2): 80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7] 伊格尔斯.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M]. 何兆武, 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 [8] 刘保国, 王小岩.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与两种模式的社会主义 [J]. 甘肃社会科学, 2003(2): 36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0] 常建华. 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 [J]. 历史研究, 1997(1): 66
- [11] [英] 马林诺夫斯基. 原始社会的性爱 [M]. 英文版. 第三版.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8
- [12] 陈启能. 《蒙塔尤四人谈》之一 [J]. 史学理论研究, 1999 (1): 158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the Research on Daily Life ——A Rethink about a Research on Social History

CHANG Li-b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re of macrocosmic, mesocosmic and microcosmic division, just as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other humane studies. They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interact each other, and eventually carry the whole research on history forward. In response to the call of the times, various field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will also relatively highlight a certain branch, thus to become one important position of interpreting social reality and historical facts, which is also the academic value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ll science itself and the rational concern about the social change. Starting with the daily lif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eople's lives and produc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deep research on social history in the hope of genuinely embodying the function of seeing what is coming from a small circle and unceasingly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depth.

Key words daily life, social history, theory and methods

(责任编辑 郭庆华)